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研究（项目号：06BZJ009）

熟悉的陌生人

Familiar Strangers: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Muslim in Urban China

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

白友涛 / 尤佳 / 季芳桐 / 白莉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宁夏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
“回族历史文化与当代回族社会发展”项目资助出版

熟悉的陌生人

Familiar Strangers: Social Adaptation of Migrant Muslim in Urban China
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

白友涛 / 尤佳 / 季芳桐 / 白莉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 /
白友涛等著. —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27-04659-2

I. ①熟… II. ①白… III. ①城市—穆斯林—流动人
口—社会生活—适应性—研究—中国 IV. ①
B969.2.2 C9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01069号

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 白友涛 尤佳 季芳桐 白莉 著

责任编辑 杨海军 丁丽萍
封面设计 刘晓盼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 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mm×980mm 1/16 印张 17.5 字数 240千
印刷委托书号(宁)0006003 印数 3000册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659-2/B·143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为流动穆斯林适应城市生活作出贡献的人们!

序

南京研究伊斯兰教的学者并不多,但是团结协作的很好。他们分别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江苏行政学院、省(市)宗教局和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每人都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大家经常在一起共同举办会议,讨论课题和学术问题,参加研究生答辩,共同接待外地学者,并将各自带的研究生集中起来,分别为他们开讲座,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没有自私的名利的索取,大家都强调奉献。正因为这样,多年来,大家不仅心情舒畅,而且获益不少。本书的作者白友涛、尤佳、季方桐、白莉四位教授就是这个团队的成员。10天前我在美国和加拿大访问期间,接到友涛教授的电话,让我为此书写几句话,且回国后一周内交稿,我不假思索,欣然领命,因为我也是这个学术团队的成员。

《熟悉的陌生人:大城市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研究》是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问题研究:以大城市流动穆斯林为例》的最终成果,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及其社会适应的学术著作。作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分别对天津、南京、深圳、上海以及兰州、西安、银川、西宁等东西部城市流动穆斯林群体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实际状况,特别是对流动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以及宗教信仰对其本人社会适应(融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比较。调查内容不仅涉及到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流出地区、流动目的、收入情况、夫妻分居、子女教育等基本情况,而且对穆斯林流动人口的宗教信仰状况、教派、礼拜次数、社会网络关系,对流入地穆斯林社区的影响甚至对特殊人群的特殊情况也做了详尽的调研(出版时又增加了“国外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的内容)。由于访谈和问

卷调查设计科学,调研细致扎实,数据翔实可靠,理论运用恰当,分析全面透彻,政策建议合理,因此,对全面、科学认识穆斯林人口流动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对政府管理部门的实际工作也有较强的指导意义,是一本读者面十分宽泛的好书。

众所周知,近30年来,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必然现象。30年前,全国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打工的农民流动人数大约在100万~200万之间,但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已高达1.47亿,占总人口的11.28%。其中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总数约2000万。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中,穆斯林约占十分之一,达200万(其中回族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他们从西部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来到经济发达的东部城市,在极大地改变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文化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在缓慢地改变着自身。

近百年来,中国穆斯林人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流动。前两次,与津浦和陇海两条铁路线(分别始建于1904年和1908年)的开通相伴,其中以中原地区回族穆斯林向江南地区的流动为主。由于当时工业和商业经济发展落后,加之社会动乱,真正能在城市扎根,成为当地居民的却是少数。第三次中国穆斯林人口大流动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加之包括西北在内的高速便捷交通网络的建成,为善于经商、吃苦耐劳的回族穆斯林提供了极佳的发展机遇,西北贫困地区的穆斯林大量向东部地区流动,人数已达200万。可以说中国东部几乎所有县、市都有流动穆斯林。对此,许多学者、伊斯兰教协会和政府管理部门都十分关注这一问题,并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但是,从“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和社会适应”这一角度,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的却不多见。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回族穆斯林过去大部分生活在农村。他们居住相对集中,除坚持严格的封斋、礼拜等功课和完整系统的宗教教育外,还严格保持着族内婚的形式。坊内清真寺,不仅是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穆斯林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活动的中心。穆斯林聚寺而住,清真寺

承担着穆斯林群体宗教和世俗生活的各种功能，处在一种自成体系的伊斯兰文化生态中。

与农村相比，生活在城市的穆斯林，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历史上形成的教坊在繁华城区改造的过程中渐渐消失，穆斯林居住更加分散，族内婚的选择余地进一步缩小，因各种条件制约，传统的宗教教育也慢慢淡出都市穆斯林的生活。丰富的都市世俗文化生活，各不相同的工作环境和谋生手段，使得人们对清真寺的依赖逐年减弱。特别是都市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逐年缩小或消失，使清真寺原有的宗教教育和社会功能进一步弱化或丧失，出现了有别于农村的都市伊斯兰文化生态。

然而，近30年来，随着西部穆斯林向东南沿海城市的大量流动，城市伊斯兰教的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有：

1. 都市穆斯林宗教信仰和情感被进一步唤醒。过去，尽管许多城市都有数千甚至数万穆斯林，但能长期坚持封斋、聚礼、会礼的人数却很少，常去清真寺的也以老人和外籍穆斯林为多。随着外来穆斯林人口的增加，参加聚礼和会礼的人数大大增加，以至于“过主麻”和重要宗教节日时，不少清真寺和固定场所都人满为患，有的甚至存在安全隐患。广州、深圳、杭州、扬州、南京、上海等地的清真寺，在开斋节、古尔邦节会礼时，一个寺往往要容纳几千甚至几万人，远远超出清真寺本身的承受能力。外地穆斯林大量拥入，一方面使得清真寺和伊斯兰教协会变得繁忙和热闹起来，另一方面也唤醒了本地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和情感，除离退休的老人外，许多中青年穆斯林也加入其中。

2. 对教职人员经训水平和清真寺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长期以来，东南沿海各城市由于多种原因，清真寺的教职人员不仅数量少，而且相当一部分是由本地老阿訇以师徒形式带出来的，没有经过系统、完整的阿拉伯语和经学教育，加之本地穆斯林绝大多数不懂阿拉伯语和经训，平时除参加殡礼外很少去清真寺，故对教职人员经训水平和清真寺的管理能力并没提出疑义。可是30年后的今天，东南沿海各城市参加礼拜的穆斯林中，外来穆斯林占大多数，他们宗教热情高于本地穆斯林，特别是一些外籍穆斯林和过去曾在老家

阿拉伯语学校或到伊斯兰国家学习过、当过几年□拉或阿訇的西北穆斯林,对当地阿訇的阿拉伯语、经学水平以及清真寺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穆斯林群体中出现观念分歧,隐藏着不和谐因素。追溯历史,东南沿海伊斯兰教既没有出现过教派,也没有出现过门宦,绝大部分穆斯林都遵循伊斯兰教哈乃菲学派的传统,教坊之间基本上也能和谐相处。然而,随着外来穆斯林的介入,穆斯林群体中在清真寺管理及宗教观点上出现了分歧,少数外来穆斯林甚至希望按照自己教派或门宦的观点影响和改造当地穆斯林。除此之外,一些外籍穆斯林对涉及伊斯兰教的国际事件和争端非常敏感,对境外发生的穆斯林游行示威等抗议活动时有积极响应,并鼓动中国穆斯林参与。上述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一些不稳定因素就会迅速扩大,进而影响当地安定和谐的局面。

4. 城市管理部门与外来穆斯林存在弥合上的困难。流入东南沿海的外地穆斯林,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与当地市民相比,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其思想观念、经营方式和生活习俗短时间内难以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同时,相当一部分城市管理部门领导和执法人员,对伊斯兰教知识和穆斯林的生活习俗缺乏全面了解。因此,对大量拥入的外来穆斯林,如何做到既尊重其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又依据法律法规加强城市管理的尺度拿捏不准,管理不当或放任不管的情况都有发生,有的还因处理失当,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出现上述新情况,其实并不奇怪,它只是我国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诸多新情况、新矛盾之一,也是中国穆斯林由农村向都市化发展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如果说庞大的流动穆斯林大军正在改变着东部城市伊斯兰教的生态环境的话,实际上他们自身也同时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其中回族穆斯林变化最为突出。

我国有10个少数民族约2000万穆斯林,其中回族穆斯林约占一半。近30年来,回族是流动穆斯林人口中比率最高的一个民族,仅以遍布全国的清真牛肉拉面馆就可见一斑。他们不仅向东南沿海发达城市流动,而且也向本

省、本地区的各个城市流动,其中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区大量生活在农村的回族穆斯林,向西安、兰州、银川、西宁、乌鲁木齐等城市流动。由于西北五省区各城市穆斯林社区,比东南沿海各城市保存的好,加之人数多,宗教氛围浓厚,流动穆斯林也多选择穆斯林聚居区或附近经商和居住,他们遇到的矛盾与东南沿海流动穆斯林相比,虽然有一定的差异,但与农村相对较为固定的宗教生活相比,对时间和空间的要求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使得每天都去清真寺的人数比例明显降低,做礼拜的次数也减少了,大部分人由原来的“每天五次礼拜”和“每周若干次”变为了参加“每周的聚礼”和“每年的会礼”;封斋的天数也呈减少的趋势;没有条件完成天课的人数比例也在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像都市穆斯林那样,投入宗教生活的时间逐步减少,而在增加经济收入、子女文化教育、个人兴趣爱好等世俗生活上花费的时间会变的更多。可以预计,只要几代人的时间,就会与东南沿海都市穆斯林所呈现的特征趋同了。

都市穆斯林与农村穆斯林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经济状况相对较好,文化程度和受教育年限逐年提高,独立生活增强,对回族群体与宗教依附性变得越来越小。二是居住更加分散,与汉族群体融入程度更高,“回汉通婚”也变得由抵制、发展到无奈的容忍。三是尽管绝大部分回族还保持伊斯兰教信仰,生活习俗也坚持伊斯兰教规定的原则,但除两大节日和参加殡礼外,常去清真寺礼拜,并对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教理熟知的人却逐步减少,除教职人员外通晓阿拉伯语的人也逐步减少。总之,从某种意义讲,都市化的回族穆斯林,重信仰和习俗,轻礼仪和功修,前者是回族和伊斯兰文化得以世代传承的基础,后者是清真寺礼拜人数减少的缘故。

一般说来,穆斯林的群居和有效的宗教教育(包括清真寺教育和家庭宗教教育)是维系穆斯林浓烈宗教氛围的两个重要条件。由于西北、中原和东南沿海上述两个条件,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都市化的进程也不尽相同。在穆斯林居住高度分散的东南沿海都市,上述两个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加之生活节奏加快,以及提高经济收入和生活品质的需求迫切,特别是环境的影响,即

使是外来穆斯林大量流入,最终也难以改变这种伊斯兰教都市化的趋势。这不仅在东南沿海如此,即使在西北的银川、兰州、西安等地也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只不过由于这些地区穆斯林人口较多,且穆斯林聚居的社区消失较慢,其都市化的进程与东南沿海有一定差异,但是可以肯定地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宗教生态的变化,中国回族伊斯兰教向都市化发展将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

《熟悉的陌生人》一书内容十分丰富,难以全面评述,上述看法只是我读罢此书的感想而已,不对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米寿江

2010年12月26日于南京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研究背景、方法和成果回顾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方法	12
三 相关成果回顾	20
第二章 研究经过和样本	29
一 研究主要经过	29
二 问卷调查样本(八城市)的总体特征	33
三 东部四城市流动穆斯林人口	41
第三章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基本状况	51
一 经济生活适应	51
二 社会生活适应	57
三 宗教生活适应	66
第四章 对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初步认识	75
一 流动穆斯林社会网络关系	75
二 流动穆斯林宗教信仰的主要特征	83
三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制约因素	92



第五章 流动穆斯林与城市穆斯林社区	105
一 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影响	105
二 穆斯林社区对流动穆斯林的影响	114
三 流动穆斯林与和谐社区建设	119
第六章 流动穆斯林的文化遗产	131
一 城市文化表达的新鲜元素	131
二 流动穆斯林文化遗产的困境	138
三 流动穆斯林文化遗产的思路	142
第七章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差异性	157
一 东西部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差异状况	157
二 社会适应差异性的原因探析	171
第八章 国外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183
一 美国的穆斯林移民借鉴	183
二 法国穆斯林移民的社会适应	196
三 国外穆斯林移民社会适应的启示	209
第九章 本研究的结论性认识	213
一 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3
二 宗教信仰对流动穆斯林社会适应的影响	223
三 流动穆斯林对城市社会和谐发展的影响	230
四 相关政策的思考	237
参考文献	247
附录	259
后 记	267

第一章 研究背景、方法和成果回顾

一 研究背景

(一)现代化和城市化

现代化反映的是人类社会从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农业社会向建立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巨变。现代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主要包括生产的工业化,居住的城市化,经济的市场化、国际化,政治的制度化、民主化,宗教的世俗化和(民族)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心理的理性化,社会生活的普遍主义,个人财富获得的自致性等。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最重要的两个方面,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最初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政府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正式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但长期的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一再延迟了实现现代化的契机。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为我们规划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步骤,到 2000 年中国基本实现了“三步走”中的前两步。党的“十六大”又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十七大”又提出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和谐社会”,21 世纪中期中国要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当前各级政府都把实现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作为工作重点。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 3000 美元,现代服务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超过 45%,非农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 70%,城市化水平达到



50%，人均预期寿命达到或超过 70 岁，平均每名医生负担的人口为 1000 人以下，成人识字率达到 80% 以上，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 10% 以上等。^①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指标，全面反映了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水平。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

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的现象和过程，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规律性现象，是“一个国家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且构成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②。城市化产生的集聚效应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化、民主化、理性化、世俗化等现代社会特征的呈现。当前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处于城市化的中前期，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并且每年以接近 1% 的速度递增。虽然中国的城市化率与世界城市化的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还有很大距离，也与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不合，但无论是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历史上曾经走过的城市化道路相比，还是与所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速度相比，当前其发展速度在世界上已经名列前茅。

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整个东部地区渐次率先发展起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个城市带中心城市的人口均逾千万。城乡收入水平的差异，城市经济中心的带动和文化的繁荣吸引着农村人口大量快速拥入城市。人口在城乡间的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一产业从业人口下降，第二、第三产业从业人口增加。人员的自由流动优化配置了劳动力资源。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城市生活方式逐渐代替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西部部分地区生态恶化，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正在遭到侵蚀。为了缓和经济发展与生态恶化之间的矛盾，1999 年中央开始推行“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农业生态平衡发展战略，加上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西部地区特别是青海、四川、甘肃、宁夏等省区农业人口大规模地流动到东部城市，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① 吴增基等. 现代社会学.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326

② 陈颐. 中国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 南京: 南京出版社, 1998. 156

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导致了一系列特殊制度的形成,实行了城乡分割,包括户籍制、单位制和土地制等在内的整套社会管理体制。这些制度的安排使得社会成员的位置“固化”,阻断了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形成了城乡二元社会管理结构。今天,这种社会管理体制虽然有所松动,但基本上得以保持,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聚集先进生产力,对农村社会具有辐射和领导优势,可以集约资源、降低成本,同时又是可以切实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大战略。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必然产生巨大的流动人口。2005年11月全国人口1%抽样调查数据表明,全国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56157万人,占总人口的42.9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74471万人,占总人口的57.01%。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了6.77个百分点。在大规模的流动人口中,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大约有2000万,其中穆斯林大约有200万。

多年来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占流动人口90%以上的汉族“农民工”问题,而对于占比例较少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略显不足,尤其对于西北少数民族中的流动穆斯林群体研究更是严重不足。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多信仰宗教,是具有宗教信仰的流动人口。在有宗教信仰的流动少数民族中穆斯林群体具有显著的特征,他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流动方式、宗教生活的方式、适应城市的方式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他们大规模进入城市以后是如何适应城市现代化生活的,其宗教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产生了哪些社会问题,给城市穆斯林社区和整个城市的现代化带来了什么影响等问题都没有现成的答案,同时这些问题又是非常重要的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①

^① 闫丽娟认为,这些问题中还包括:(1)流动穆斯林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2)经济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问题;(3)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不同而引发的民族关系问题;(4)城市穆斯林社区的发展问题;(5)穆斯林群体合法权益保障问题;(6)政府相关部门行政和社会管理引发的问题;(7)流动穆斯林和城市穆斯林社区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等。见闫丽娟:《民族工作的社区化:城市化进程中协调民族关系的一种视角》,《贵州民族研究》,2006(1)



(二)宗教事业的快速发展

宗教是人类共同信仰,是基于人类基本生存状况的基本需求之一,是世界多数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宗教信仰问题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并且还将长期存在下去。目前世界有60多亿人口,70%以上的人有宗教信仰。中国有接近2亿的人口有宗教信仰,他们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对于信教群体的宗教信仰问题进行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全球有11亿~13亿信教人口,以穆斯林人口为主体的国家有40~50个。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经1350多年。中国有10个少数民族几乎全民信仰伊斯兰教,总人口大约2000万,穆斯林散布于几乎全国所有的县市,但主要分布在中西部省区。城市、乡村多有穆斯林聚居的社区。中国穆斯林是具有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双重文化属性的群体,他们的生活和社会适应情况长期以来很少受到学术界的关注。穆斯林“认主独一”^①,崇尚善行,主张和平和顺从真主,追求“两世吉庆”^②,是中国多元文化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唯物思潮、科学主义一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但是“科学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普及导致人类的毁灭也可能就在一个“世界疯人”的一念之间。无数的事实证明,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给人类带来繁荣和福祉,也同样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原子弹的爆炸,“反恐”战争和恐怖主义的盛行,人体克隆技术的日渐成熟,全球气候变暖,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大量物种的灭绝等,都说明人类和谐发展面临的困难日渐增多,科学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又是何等的无能为力。而宗教信

① 穆斯林的信仰是绝对的一神信仰,主张世界只有一个主宰(安拉),圣人穆罕默德只是安拉派遣的软差,一个使者,也是人。

② 既重视今生,又重视后世。穆斯林主张今世和后世要兼顾。穆斯林只要虔诚信仰真主,并按照真主的“定制”去生活,就能够获得福及两世的回报。

仰则是促使人们反思科学灾难的清醒剂。

20世纪80年代以来,宗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在修正人们的物欲与客观世界的矛盾方面,在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方面,在缓解社会阶层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的正功能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宗教对于社会发展和社会阶层的整合也具有负功能,如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社会竞争,影响科学知识的普及,导致社会进化的速度减慢,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信仰不同)导致社会冲突等,这些负功能在中国长期以来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强调。我们主张在肯定宗教负功能的前提下,要充分认识其正功能。

关于宗教的正功能,学术界大致达成了如下共识:

(1)社会整合的功能。“价值的协调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也就是说,某一社会体系的大多数成员所希望、所同意的那些共同的目的和原则,是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基础。”^①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也认为,社会之所以达到团结,首先就因为某些最高的价值和目的是这一社会的成员所共有的。宗教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之一就是通过把人类的价值规范神圣化,来敦促教徒自觉遵守社会规范,从而对他们的行为进行整合。

(2)心理调试的功能。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 1908~1970)的需要层次理论来看,生存需要是一种最基本的需要,也是最起码的需要。^②诚如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所言,人并非只靠面包而活。“宗教并不是唯一能够满足此需求的手段,然而事实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绝大多数人依靠的都是这种手段,而且看来还将长久依靠它。”^③宗教可以为教徒提供安全感和某种慰藉,使之消除心理上的焦虑与恐惧。缓解、消弭“人与自我”的矛盾是宗教的专长之所在。

① 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134

② [美]马斯洛等.人的潜能和价值.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62~168

③ 孙雄.圣俗之间——宗教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207